

社会公平感、机构信任度与公共合作意向^{*}

张书维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广州 510275)

摘要 社会公平从古至今都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对社会公平的感知即社会公平感直接决定着个体的机构信任, 并影响其公共合作参与。本研究将社会公平感分为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 将机构信任度分为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 采用实验室情境设计的方法, 引入最后通牒博弈和免责博弈范式, 通过 2 个实验系统探讨“公正无私, 一言而万民齐”的因果机制。研究发现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正作用于个体的公共合作态度与意向, 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公共合作的双路径模型: 外部路径由分配公平产生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 进而触发公共合作; 内部路径由程序公平产生动机信任和工具信任, 进而触发公共合作; 二者结合构成个体参与公共合作的双动力系统。双路径模型的适用性在组织情境和社会情境下均得到了支持。

关键词 分配公平; 程序公平; 工具信任; 动机信任; 最后通牒博弈; 免责博弈; 公共物品困境

分类号 B849: C91

1 问题提出

社会公平(social justice)从古至今都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Sabbagh & Schmitt, 2016; 郭永玉, 杨沈龙, 胡小勇, 2017)。从《论语》提出的“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到《圣经》(箴 14: 30)告诫的“公义使邦国高举”, 无不体现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¹的普遍共识。在组织管理研究领域, 对组织公平(organizational justice)已有了一套完整且被广为使用的定义, 即指人们对组织公平性的整体感知(Colquitt, Greenberg, & Zapata-Phelan, 2005; Greenberg, 2011; Guo & Giacobbe-Miller, 2015; 李超平, 王桢, 毛凯贤, 2016; 苗青, 陈思静, 宫准, 洪雁, 2015), 本文在此基础上使用“社会公平”的概念, 用“社会公平感”来代指个体对社会公平性的整体感知。

我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同时, 社会发展亦动力受阻: 数据表明, 在按

劳分配领域、按要素分配领域、社会总产品分配领域和商品交换领域内广泛存在着利益分配不公¹; 潜规则现象盛行则暴露出明显的程序不公(林炜双, 高腾, 孙李银, 景怀斌, 2010; 易成非, 姜福洋, 2014)。这一切使得社会风险有所加剧(宋林飞, 2016), 社会稳定正在遭受威胁(张书维, 王二平, 2011; 张书维, 2015)。转型社会中, 社会公平感直接决定着民众对当权者合法性的认可(Johnson, Hegtvedt, Khanna, & Scheuerman, 2016; Wegener, 2000), 这构成了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Levi & Stoker, 2000; Tyler, 2011a)。调查发现,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 10 余年间, 中国民众的总体政治信任已经出现下滑态势(Wang & You, 2016; 孟天广, 2014), 且实际信任水平比调查结果更低(Li, 2016)。这会导致民众各种不合作, 如不响应各地红十字会捐款的倡议, 乃至对抗政府的行为, 如群体性事件(Wang, Zhang, Zhou, & Feng, 2014; 张书维, 2013a)。政民之间的不良互动模式已成为当下社会治理亟待破解的难题。作为执政者,

收稿日期: 2016-09-30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7130117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3&ZD041; 13&ZD011; 16ZDA110)

通讯作者: 张书维, E-mail: zhshuw2@mail.sysu.edu.cn

温家宝会见中外记者: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新华网, 2010 年 3 月 14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3/14/content_13169432_2.htm

¹ 孔陆泉, 张正云: 我国四种领域的利益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5 年 9 月 15 日. 详见 http://econ.cssn.cn/jjx/jjx_gzf/201509/t20150915_2343506.shtml

迫切需要将《淮南子·修务训》里所描绘的“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由理想变为现实。本文聚焦点就在“万民齐”即“公共合作”(public cooperation)，指个体决定通过自身行动帮助群体、组织乃至社会变得有效和成功(Tyler, 2011a; 张书维, 许志国, 徐岩, 2014)。通常意味着克制短期私利遵守规则，从而有益于集体利益和长期的个人利益，如工作场所的角色外行为、社会生活中的自觉纳税乃至带有政治色彩的入伍参战(Tyler, 2008, 2011b)。因此，本研究拟解决的核心科学问题是：社会公平感如何影响公共合作？其背后存在着怎样的心理机制？

1.1 社会公平感——公共合作的前提

社会公平被视为一种现实的或理想的状态，它需满足三个客观条件：第一，利益和负担的分配遵循一系列原则；第二，政治或其他决策的制定过程和规则体现出对个体和群体基本权利的保护；第三，民众受到权威及相关人士有尊严的对待和尊重(Jost & Kay, 2010)。基于客观公平的主观感知即是社会公平感(Gollwitzer & van Prooijen, 2016)；以上三条其实就对应了社会公平感的三种类型，依次是分配公平(distributive justice)、程序公平(procedural justice)和互动公平(interactional justice)。分配公平侧重于结果，即个体对于资源分配公平性的感知(Deutsch, 1985; Jasso, Törnblom, & Sabbagh, 2016)，程序公平聚焦于过程，指个体对于决定结果的规则、机制、过程公平性的感知(Thibaut & Walker, 1975; Vermunt & Steensma, 2016)，互动公平则涉及人际交往，强调交往中个体感知到的所受对待是否公平(Bies & Moag, 1986)。广义上讲，互动公平亦属于程序公平，受到有尊严的对待和尊重包含在公平的程序之中(Tyler, 2000)，程序公平与互动公平共同体现出“公平过程效应”(van den Bos, 2005, 2015)。对于社会公平感而言，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最为重要(Jost & Kay, 2010; Vermunt & Steensma, 2016)。基于此，本研究主要关注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

关于分配和程序公平，组织领域已有大量的研究(Cropanzano & Ambrose, 2015; Greenberg & Colquitt, 2005; Moliner, Cropanzano, & Martínez-Tur, 2017; 张松, 戴春林, 李茂平, 2010)。一个稳健(robust)的结论是公平感能促进个体的有效合作，从而实现较高质量的社会协调(Colquitt & Zipay, 2015; Rankin & Tyler, 2009; Tyler, 2012)。近年来的研究焦点开始由组织管理的微观领域向公共管理的微观领域转变，社会公平感是政治行动的核心

(Rothmund, Becker, & Jost, 2016)。这其中，程序公平与合作行为的关系尤受瞩目：研究发现，相对于分配公平，程序公平更显著地影响民众对警察的支持与合作(Sunshine & Tyler, 2003; Tyler, 2017; van Damme, Pauwels, & Svensson, 2015)；程序公平受到快乐或愤怒的情绪中介，进而影响人们的顺从行为(Barkworth & Murphy, 2015; Murphy & Tyler, 2008)。当政策结果对民众不利时，程序公平对民众的公共政策支持行为影响更大(Wu & Wang, 2013)。程序公平与合作行为的正相关已在民众对法律实施的配合行为中得到了跨情境的验证(Huq, Tyler, & Schulhofer, 2011)；即使对于精神病患者而言，更高的程序公平，亦能带来更多的合作与更少的反抗(Watson & Angell, 2013)。而对于分配公平与合作行为的关系，虽然提出较早，但始终未引起学界足够的注意(张书维等, 2014)。

西方学者的研究更加重视程序公平，一方面有其文化传统的深层次原因；另一方面，是源于“只有保证分配过程的公平性，才能有分配结果的公平性”这一西方社会广泛接受的常识(李晔, 龙立荣, 刘亚, 2003)。而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分配公平在过去乃至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李骏, 吴晓刚, 2012; 孟天广, 2012; 孙明, 2009)。换言之，程序公平在我国的作用，似乎并没有在西方情境下那么显著。尽管程序公平的概念内涵具有东西方的相似性，但中国情境下的组织公平受文化价值观和制度环境的影响更大(Guo & Giacobbe-Miller, 2015)。故而在公共管理领域内探讨分配公平及其影响，对于研究中国面临的社会公平问题，具有特殊价值。张琦(2010)的研究发现，灾难情境下，分配公平感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合作；非灾难情境下，程序公平感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合作。不过研究中仅对分配公平感和程序公平感进行了测量，缺乏操纵。另外两项问卷调查显示，在个人规范较低的人群中，分配公平与荷兰小企业主的交税态度和行为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分配公平感越高，企业主纳税越积极(Verboon & Goslinga, 2009)；与之相对，较低的分配公平感使得智利民众积极参与抗议示威(Castillo, Palacios, Joignant, & Tham, 2015)。目前尚缺乏同一实验情境下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影响民众公共合作态度和行为意向的因果研究。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1-3：

H1：高分配公平的个体比低分配公平的个体更加支持公共合作。

H2: 高程序公平的个体比低程序公平的个体更加支持公共合作。

H3: 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同时正作用于个体的公共合作行为意向。

H1 和 H2 首先从个体对于公共合作的态度切入, H3 及后续的研究假设再进一步聚焦到行为意向上, 这是与实际行为最接近的预测变量(Ajzen & Fishbein, 1980; 张书维, 王二平, 周洁, 2012; Zhou & Wang, 2012), H3 同时也为后续假设奠定基础。

1.2 机构信任度——公共合作的诱因

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 是一个跨学科多层次多维度的概念(Shockley, Neal, PytlikZillig, & Bornstein, 2016)。代表性定义如 Rousseau, Sitkin, Burt 和 Camerer (1998)将其概括为: 信任是一种心理状态, 它基于个体对对方行为意图的积极预期而愿意接受由此带来的风险。“积极预期”的关键在于可信度(trustworthiness) (Colquitt, Scott, & LePine, 2007; Levi & Stoker, 2000)。根据被信任方的层次关系, 可划分为“横向”的人际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和“纵向”的机构或制度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使用“制度信任”的概念时, 是指以抽象的制度作为对象的信任。这里关注具象的“机构信任(度)”。狭义的机构信任一般仅指公民对政府和政治机构的信任(王正绪, 2016); 本研究采用广义界定, 囊括组织信任(organizational trust/trust in organization)和政府信任(trust in government)。前者是个体对(所属)组织可信度持有的积极信念(Mayer, Davis, & Schoorman, 1995; Schoorman, Mayer, & Davis, 2007); 后者是个体对(当地)政府可信度持有的积极信念(Citrin & Muste, 1999; Grimmelikhuijsen & Knies, 2015)。因此, “机构信任”是指个体对机构可信度持有的积极信念。由于机构能够提供更多资源帮助人们实现个人目标, 故对于现代社会而言, 机构信任比人际信任更为重要(Khodyakov, 2007)。现实中, 它既体现着机构存续的合法性或正当性; 同时又是机构有效运行的保障。大而化之, 机构信任是整个社会系统实现功能优化的关键所在(Neal, PytlikZillig, Shockley, & Bornstein, 2016)。

关于组织信任的维度, Mayer 等(1995)将其概括为能力(ability)、善意(benevolence)和正直(integrity)。遵循这三个维度, Mayer 和 Davis (1999)随后开发出相应的测量问卷, 后被广泛采用。政府信任的维度延续了这一思路, 通常使用胜任力(competence)、善意(benevolence)与诚实(honesty)三个维度加以量化

(Grimmelikhuijsen & Knies, 2015; Zhang & Wang, 2010; 马亮, 2016)。从中可以看出, 政府信任和组织信任的测量如出一辙: 一边是被信任者“工具性”的能力或胜任力, 另一边是被信任者“动机性”的意愿和品质(Bøggild, 2016; Lu, 2014; 李艳霞, 2014)。鉴于合作动机有“外在工具性”与“内在社会性”的双重属性, 机构信任亦可根据性质不同区分为工具信任(instrumental trust)和动机信任(motive-based trust) (Tyler, 2011b, 2016)。前者基于个体对机构做事能力的评价, 即个体对特定机构是否可以履行职能的积极信念, 主要是结果导向的; 后者基于个体对机构行事动机的评价, 即个体对特定机构是否愿意“为民服务”的积极信念, 更多是过程导向。将机构信任的内容划分为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 既是对已有组织信任与政府信任研究的继承与发展; 更重要的, 能够更全面考察机构信任样态, 厘清不同机构信任的作用效果鉴。

信任与合作联系紧密(Sullivan, Snyder, Sullivan, & Chapp, 2008)。一方面, 研究显示, 组织信任直接影响着员工的工作态度和行为(姚琦, 马华维, 2013), 特别是诸如组织公民行为这样的角色外行为(方娜, 2013); 另一方面, 政府信任与合作行为存在较稳定的正相关(Kim, 2005)。Chanley, Rudolph 和 Rahh (2000)的调查显示, 民众对公共政策的支持度受信任水平的影响。政府信任水平越高, 民众对牺牲自身物质利益的公益政策的支持度就越高(Hetherington, 2005; Rudolph & Evans, 2005)。高信任的民众对政府的相关要求会更积极的遵守和参与, 如缴税、投票和自觉遵纪守法(Hetherington, 1999; Scholz & Lubell, 1998; Tyler, 2011a; 张书维, 景怀斌, 2014)。总之, 无论是现实中的工作场所和公共场合(Tyler, 2011b), 还是实验中各种形式的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s) (Balliet & van Lange, 2013), 大量跨领域研究一致地揭示信任对合作与遵从行为的正效应(Hamm et al., 2016)。但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机构信任的对象之别(组织和政府), 没有聚焦性质差异(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 因此无法辨别两种信任在促进合作行为上的作用。

1.3 社会公平感、机构信任度与公共合作

作为合作行为的两个重要的前因变量, 公平感和权威信任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张琦, 王二平, 2010)。所谓“权威信任(trust in authority)”是指个体对权威可信度的积极信念(Greenberg & Colquitt, 2005)。元分析显示, 组织情境下的分配公

平与程序公平均正作用于权威信任,且程序公平的影响更大(Colquitt, Conlon, Wesson, Porter, & Ng, 2001)。这可以通过公平启发式理论(fairness heuristic theory)加以解释——在个体进行一般公平判断时,代表关系价值的程序公平比象征工具价值的分配公平更加重要(Lind, 2001; 龙立荣, 2004)。简言之,公平感会影响个体对权威者的信任水平,这可看作权威与个体之间的社会交换或互惠(Aryee, Budhwar, & Chen, 2002; Colquitt et al., 2013),特别是程序公平(De Cremer, 2004; 吴玄娜, 2016)。已有研究中权威信任的对象主要局限在组织内部,如对管理者的信任;而机构信任已超越了组织的范畴。机构信任作为更概化(generalization)和非个人化的权威信任,社会公平对其的作用尚缺乏实证支持。更进一步,社会公平感经由机构信任对公共合作的间接作用又如何表现?学界并未对此展开研究。

一方面,分配公平聚焦结果,而工具信任恰是对机构行为结果(体现在能力上)的认知与评价;另一方面,程序公平聚焦过程,而动机信任恰是对机构行为过程(体现在意愿上)的认知与评价。据此推论,分配公平与工具信任之间关系更强;程序公平与动机信任之间关系更强。结合前面两部分“社会公平感是公共合作的前提;机构信任是公共合作的诱因”的论述,可以对社会公平感、机构信任与公共合作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如下的研究假设:

H4: 工具信任部分中介社会公平与公共合作意向的关系:

H4a: 工具信任部分中介分配公平与公共合作意向的关系;

H4b: 工具信任部分中介程序公平与公共合作意向的关系。

H5: 动机信任部分中介社会公平与公共合作意向的关系:

H5a: 动机信任部分中介分配公平与公共合作意向的关系;

H5b: 动机信任部分中介程序公平与公共合作意向的关系。

H6: 分配公平通过工具信任影响公共合作意向的中介作用强于其通过动机信任影响公共合作意向的中介作用。

H7: 程序公平通过动机信任影响公共合作意向的中介作用强于其通过工具信任影响公共合作意向的中介作用。

以上三个研究假设组合形成“民众对(权威)机

构合作的双路径模型”。

1.4 最后通牒博弈及免责博弈的新应用——操纵社会公平感

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 UG)是研究公平感使用最多的决策范式(罗艺, 封春亮, 古若雷, 吴婷婷, 罗跃嘉, 2013; 王赟, 吴斌, 李纾, 周媛, 2015)。在经典UG范式下,两名实验参加者分别扮演“分配者”(proposer)和“接收者”(responder)两种角色,来分配一笔总额固定的现金。其中分配者有权提出分配方案,接收者有权接受或拒绝该方案。若接受,就按分配者的方案来分;若拒绝,则两人都将一无所获(Debove, Baumard, & André, 2016; Güth, Schmittberger, & Schwarze, 1982)。这个过程中,无论分配者还是接收者皆为彼此匿名且随机指定的个体,除“实验参与者”的角色之外并不知晓对方更多的身份信息。接收者所体会到的分配公平源自分配者对现金的公平分配。因此,可以利用UG范式涉及的“结果公平”实现对分配公平的操纵(Konow & Schwettmann, 2016; 陈叶烽, 周业安, 宋紫峰, 2011)。此做法遵循传统博弈游戏决策研究的惯用思路:通过在分配方案中使用不同比例导致结果差异,来探讨接收者所做决策背后的心理机制(李纾, 2016)。其中,五五开的方案即分配者和接收者各获得奖金的50%最能代表公平(Yamagishi et al., 2012; 毛孟凯, 2015)。需注意,量上的平均分配并不必然产生分配公平(Rasinski, 1987; 徐梦秋, 2001);UG范式的适用范围限于人际层面的匿名互动,此时均分做法最易被认为公平。这一公平从性质上说,亦属于人际公平而非社会公平(张蔚, 张振, 高宇, 段华平, 吴兴南, 2016)。如果将UG范式拓展到个体与机构互动的层面,则代表分配公平的比例需要重新检验。具体说来,当某一组织或政府成为分配者时,作为个体的接收者是否还满足于所得资源的对半分?以往研究从未涉足这一方面。研究者将通过预实验对此加以考量。

如果将关注点放在接收者身上,按照“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接收者应该接受任何非零的分配方案,因为聊胜于无(Nowak, Page, & Sigmund, 2000)。有趣的是,大量实验结果表明,随着分配额度的降低,拒绝率增加(Glimcher & Fehr, 2014);当分配给接收者的额度比例低于20%时,被拒绝的概率高达50%(Sanfey, Rilling, Aronson, Nystrom, & Cohen, 2003)。可见,过去都聚焦在分配方案的结果上,并对接收者看似“非理性”的拒绝行为提出了不平

等规避心理(inequity aversion)的解释(Fehr & Schmidt, 1999), 指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着公平偏好。然而, 经典 UG 范式中暗藏的程序公平过程却一直被学者所忽视。显而易见, 分配者和接收者在实验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分配者主导了分配方案, 接收者则对分配结果拥有“发言权”(voice)。发言权被视为是影响程序公平判断最重要的因素, 有发言权的程序更易被人们认为是公平的(林晓婉, 车宏生, 张鹏, 王蕾, 2004)。因此, 有无发言权是程序公平研究中最常用的一种实验操纵方法(高记, 马红宇, 2011)。发言权效应可进一步划分为工具性发言权(instrumental voice)和非工具性发言权(non-instrumental voice), 二者的区别在于个体对结果或决策是否有实质性或重要性影响(Avery & Quiñones, 2002; Hibbing & Theiss-Morse, 2008; Lind & Tyler, 1988)。研究表明, 工具性发言权条件下被试知觉到的程序公平显著高于非工具性发言权的条件(Lind, Kanfer, & Earley, 1990; Platow et al., 2013), 由此带来被试对分配满意度和结果遵从度的提升(Hibbing & Theiss-Morse, 2008)。UG 中接收者可以拒绝分配者的分配方案(以此惩罚分配者), 从而改变分配的结果。这是工具性发言权效应最直接的体现。现实中, 个体与组织机构或政府机构进行资源分配的互动时, 无论何种类型的机构几乎无一例外的处于分配者的强势和主导地位; 个体则基本处于接收者的弱势和从属地位。因此, 使用 UG 来进行程序公平的操纵, 不仅合理, 而且可行。免责博弈(impunity game, IG)可看作 UG 的变式, 不同之处在于: 接收者的决策只会影响他自己的所得; 无论接收者选择接受或拒绝, 分配者都可以得到他分给自己的那部分金额; 面对不利的分配方案, 如果接收者选择拒绝, 则自己将一无所有(Bolton & Zwick, 1995; Yamagishi et al., 2012)。IG 与独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 DG)无本质区别, 不过 DG 侧重于研究分配者的心理, IG 侧重于研究接收者的心理。Yamagishi 等(2009)的实验研究显示, 即使在 IG 的情境下, 接收者拒绝极端不公平方案的比例仍然高达 30%~40%。显然, 与 UG 相比, IG 中只可能存在非工具性发言权效应, 因为接收者的拒绝左右不了分配结果。因此, 可用 IG 来操纵程序不公。总之, 可以通过 UG 和 IG 中“工具性发言权的存废”这一分配规则的公平与否来实现对程序公平的操纵, 规则公平是程序公平的应有之义(高记, 马红宇, 2011; 林晓婉等, 2004)。

综上, 本研究从社会公平的视角出发, 旨在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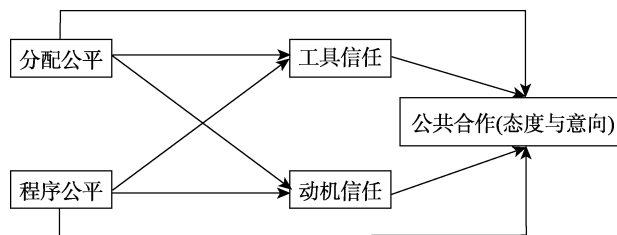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理论模型及变量关系示意图

立个体的社会公平感通过机构信任影响公共合作的双路径模型(如图 1 所示); 同时尝试将最后通牒博弈和免责博弈两个决策范式应用到全新领域。为实现此目标, 运用实验室情境设计(scenario)的方法对此进行系统探讨。具体而言, 通过预实验确定分配公平的恰当比例; 实验 1 利用预实验的结果, 在组织情境下检验 H1-H7; 实验 2 在实验 1 的基础上, 于社会情境下检验 H1-H7。

2 预实验: 确定分配公平的取值

预实验的研究目的是为实验 1 和实验 2 用 UG 和 IG 操纵社会公平变量时, 确定分配公平的恰当比例。在经典范式下, 绝对公平的分配方案应是分配者将 50% 的现金留给自己; 将另外 50% 的现金给予接收者。本研究不同于传统之处在于, 扮演分配者的是非个人化的机构。面对掌握着大量资源的机构, 作为接收者的个体处于弱势和被保护的地位。这一差别将可能影响到个体对资源分配结果的感知。因此, 有必要对实验情境中分配公平的比例进行重新检验。

2.1 方法

2.1.1 被试

被试为 120 名 S 大学修读《心理学导论》必修课的公共管理类大二本科生, 平均年龄 19.4 岁($SD = 0.78$)。其中, 男 53 名, 女 67 名。参与本实验是这门课程的一个必修环节。

2.1.2 实验程序与材料

本实验的操纵变量为分配公平, 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Yamagishi et al., 2012), 结合本研究的实际情况, 预设 3 个比例: 1) 分配者 90% vs. 接收者 10%; 2) 分配者 50% vs. 接收者 50%; 3) 分配者 10% vs. 接收者 90%, 构成分配公平的 3 个水平。被试被随机分配到这 3 个实验条件下, 每个条件 40 人。

实验材料如下:

今年是 A 大学的 100 周年校庆²。校庆前夕, 从

² S 大学(被试所在学校)建校至实验时为 90 年。

该校“校友事务办公室”获悉，已与某地校友会初步达成了一笔 2000 万元的捐款意向。捐赠者要求这笔钱须以适当比例惠及每个在校生。为保证实现这一目的，捐赠者提出一个特别的条件：若每少一名学生享受到该福利，就会核减相应的捐款数额(具体规则详见由校方提出的分配方案)；学校对于这笔捐款的分配方案应征询每个学生的意见；最后入学校账户的捐款金额视分配结果而定。据统计，该校共有全日制在校生 5 万人(包括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现在假设你是 A 大学的一名在校本科生。校方经过研究，提出的分配方案为：将捐款总额的 10%/50%/90%用于学生。即拿出 200/1000/1800 万元，给 5 万名在校生每人的校园卡里充值 40/200/360 元，算是给同学们发的“校庆费”。另悉，校方所获捐款的用途待定。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部分捐款将不再直接用于学生福利。

被试阅读完实验材料后，需要回答是否接受这一分配方案(1 接受；2 拒绝)以及“作为 A 大学的一名在校本科生，你觉得按照校方所提出的分配比例，你所得的结果是否公平？”选项从“1 非常不公平”至“5 非常公平”。分值越高表示分配公平越高。

2.2 结果

从表 1 可知，自变量分配公平在 3 个水平下的均值呈现出逐渐升高的趋势。进一步做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结果为 $F(2,117) = 194.11$ ， $p < 0.001$ ， $\eta^2 = 0.77$ ，差异显著。因为预实验的目的是要找到分配公平的低值和高值，从而确定取值。由实验结果来看，分配者 90%与接收者 10%的分配比例可作为低分配公平的实验条件；分配者 10%与接收者 90%的分配比例可作为高分配公平的实验条件。独立样本 t 检验显示，分配公平在这两个水平上差异显著， $t(78) = -20.76$ ， $p < 0.001$ ，Cohen's $d = -4.64$ 。而分配者 50%与接收者 50%分配比例之下的分配公平值为 3.03，接近于分配公平选项的中等水平 3。可见，人际互动中均等的比例并不适用于个体与机构的互动。

另外，在问及被试是否接受分配方案时，3 个实验条件下的接受者数量差异不大(见表 1)。有意

思的是，当分配者仅仅给予接收者总额 10%的现金时，尽管接收者此时感受到的分配公平很低($M = 1.60$ ， $SD = 0.71$)，但只有 6 名(15%)的被试选择了拒绝。后文将结合实验 1 和实验 2 的结果对此进一步展开讨论。

2.3 讨论

预实验中设置的分配公平 3 个比例，第一个和第三个单从数量上来说，是“不均”的。然而恰恰是“分配者 10%与接收者 90%”(即 1:9)这一有偏的分配，结果在接收者眼中最最公平($M = 4.55$ ， $SD = 0.55$)，此时的结果公平更接近于结果宜人性(outcome favorability)的内涵，即分配的结果于个体而言有利，事实上不管从概念还是经验的角度“结果公平”与“结果宜人性”都是高相关的(van der Toorn, Tyler, & Jost, 2011; Bianchi et al., 2015)。得到理想的结果是人们产生分配公平判断的必要前提(龙立荣, 2004; 龙立荣, 刘亚, 2004)。表 1 的数据再次说明，UG 中关于分配比例的操纵是分配公平产生的有效手段；且校方充当“分配者”时，5:5 的“平均分配”方案并不能引发高的分配公平感，1:9 的“按需分配”方案(相比于学校，学生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更“需要”这笔钱)才被视为“最公平”。

本研究作为后续研究的预实验，为 UG 和 IG 情境下的分配公平确定了取值：低分配公平条件下，分配者与接收者的分配比例为 90%和 10%；高分配公平条件下，分配者与接收者的分配比例为 10%和 90%。实验 1 和实验 2 将以此为根据，对分配公平进行实验操纵。

3 实验 1：组织情境下公共合作的双路径模型

实验 1 试图在组织(某高校)情境下，验证社会公平与公共合作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建立社会公平感通过机构信任影响公共合作意向的双路径模型。实验中，对分配公平高低的操纵使用预实验确定的分配比例；对高程序公平的操纵通过 UG 来实现，对低程序公平的操纵通过 IG 来实现(详见方法部分的介绍)。公共合作行为意向的测量则会给被试设置一个公共物品困境的实验情境。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会面临短期个人利益和长期群体利益的冲突，如温室气体排放，地下水污染，渔业过度捕捞等环境资源问题；慈善机构捐款不足和各地医院频现“血荒”等公共物品问题。此类由于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情境，便是社会困境(陈晓萍, 2013; van

表 1 预实验结果

实验条件	分配比例 ^a	分配公平 $M(SD)$	接受者数量
1 ($n = 40$)	90% : 10%	1.60 (0.71)	34
2 ($n = 40$)	50% : 50%	3.03 (0.73)	37
3 ($n = 40$)	10% : 90%	4.55 (0.55)	40

注： $n = 120$ ；^a 分配比例——分配者 : 接收者。

Lange, Joireman, Parks, & van Dijk, 2013)。社会困境通常涉及两人或多人,它具有两个属性(刘长江,郝芳,2014):1)不管社会中其他个体怎么做,相比于做出合作选择,每一个体做出非合作选择获得更高的收益;2)如果所有人都选择不合作,那么所有个体得到更低的收益。其中,公共物品困境(public good dilemmas)属于给予博弈(give-some games);资源困境(resource dilemmas)属于索取博弈(take-some games)(van Lange, Balliet, Parks, & van Vugt, 2014)。相比于资源困境,公共物品困境更能体现出个体的合作程度,因为后者意味着付出更强的努力或放弃更大的眼前利益。比如小区居民为自己所住的老楼加装电梯众筹资金要比居民为所在小区的公用绿地减少破坏投入更多。因此,本研究选取公共物品困境作为观测个体合作意愿的实验情境,让被试在个人账户和公共账户之间分配资源(陈欣,赵国祥,叶浩生,2014;Fehr & Gintis, 2007)。对公共账户贡献越多,则个体短期获益越小,相应的集体获益越大,说明该被试越倾向于合作。

本实验所涉及的变量间关系如图 1 所示,需检验 H1-H7。

3.1 方法

3.1.1 被试

被试为 150 名 S 大学选修《社会心理学》通识课的本科生,来自文理工 16 个不同的学院,平均年龄 19.5 岁($SD = 1.08$),男 54 名,女 96 名。参与本实验是这门课程的一个必修环节。

3.1.2 实验程序与材料

本实验为 2(分配公平:高,低)×2(程序公平:高,低)被试间设计。因变量为公共合作行为意向。

被试被随机分配到 4 个实验条件下。所有被试被安排在同一间大会议室内,整个实验期间单独阅读材料填答问卷,在实验过程中无互动。故本研究收集和 analyzing 的数据仍属个体水平。实验伊始,主试向被试介绍实验目的、规则及报酬等信息。

实验分 3 个步骤:

首先,对被试进行社会公平的操纵。让被试阅读社会公平的实验材料。实验情境同预实验,分配公平的操纵由“分配比例”来实现(高分配公平:校方 10%,学生 90%;低分配公平:校方 90%,学生 10%),程序公平的操纵则由“分配规则”来体现(高程序公平:学生若拒绝校方的分配方案,双方均无所得;低程序公平:学生若拒绝校方的分配方案,只损失自己的利益,校方所得并无影响)。

被试阅读完这部分材料后,填写一份包括情境理解测试,社会公平感操纵检验,机构信任测量在内的问卷一。

其次,收集被试的公共合作行为意向。让被试阅读第二份材料,一个关于为校内食堂捐资的公共物品困境³:

近年来,由于物价和人力等成本的持续上涨,高校食堂里的菜价也水涨船高。针对学生普遍反映的食堂“快要吃不起”的现状,为了保证学生的集体权益,同时兼顾食堂的利益,A 大学打算设立一个名为“平价食堂”的公共基金,旨在推动食堂降价。公共基金通过如下方式募资:一方面号召 A 校学子自愿捐款;另一方面只要捐款该公共基金账户,校方就会以 1:1 的配套资金注入。如假设 5 万在校生每人捐款 100 元(共 500 万元),加上学校的等额配套资金(500 万元),该公共账户将拥有总计 1000 万元的资金。这笔钱将全部用来补贴 A 大学的校内食堂(营业性的餐厅除外),目标是在当前水平上将校内各食堂菜价统一下调 20%,并力争维持较长时间。当然,这一目标能实现多久(三年还是三天),要视公共基金的财力来定——学生捐款越多,校方相应的配套资金也越多,降价就越可能持久;如果无一人捐款,那么学校的配套资金也将落空,各食堂仍维持现有售价。总之,无论学生捐多捐少,校方都会在此基础上等额追加。只要“平价食堂”公共基金设立,在可维持的时间里,降价的福利将惠及所有去校内各食堂用餐的 A 校学子。

被试阅读完这部分材料后,要求被试填写愿意捐出的数额(问卷二)。

最后,要求被试填写包括相关控制变量、个人信息在内的问卷三。

3.1.3 变量操纵与测量

分配公平 1 个题项,用于自变量操纵检验,同预实验。

程序公平 1 个题项,用于自变量操纵检验。“作

³ 取材自 2008 年的一则新闻——《广东学子每月伙食增加 40 元补贴 具体尚在商讨》:“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召开高校食堂工作视频会议透露,将按照每生每月 20 元的标准,给予中央部门所属高等学校学生食堂一次性临时补贴 18928 万元,同时要求地方政府和高校也要按照中央标准安排补贴资金。昨日记者采访广东两所部属院校中大和华工有关部门得知,此项补贴是直接补给饭堂还是学生目前仍在讨论。” <http://gd.sohu.com/20080307/n255582100.shtml> 如果高校选择将此项补贴直接补给饭堂,从某种程度上说,无异于“强制”学生捐款。实验情境将“中央拨款+学校配套”改为“学生捐款+学校配套”,以满足公共物品困境的基本条件。

为A大学的一名在校本科生,你觉得按照校方所遵循的分配规则,你受到的对待是否公平”;选项从“1 非常不公平”至“5 非常公平”。分值越高表示程序公平越高。

工具信任3个题项,改编自Tyler (2011b), $\alpha = 0.82$,如“我认为A大学校方能够制定出解决问题的对策”;选项从“1 非常不同意”至“5 非常同意”。分值越高表示工具信任越强。

动机信任3个题项,改编自Tyler (2011b), $\alpha = 0.73$,如“我相信A大学校方所做是为了最好地维护像我这样的A校学生的利益”;选项从“1 非常不同意”至“5 非常同意”。分值越高表示动机信任越强。

公共合作态度的收集,询问被试:“作为A大学的一名在校本科生,你支持A大学设立‘平价食堂’公共基金吗”,选项从“1 完全不支持”至“5 完全支持”。分值越高表示公共合作的态度越强。

公共合作行为意向的收集,询问被试:作为A大学的一名在校本科生,你愿意捐出___元(≥ 0 的任意金额)设立“平价食堂”公共基金。

考虑到社会价值取向(social value orientation)即个体在相依情境中对自己和他人结果分配的特定偏好(Balliet, Parks, & Joireman, 2009),是影响社会困境下个体合作行为最常见的人格特征(刘长江,郝芳,2011;刘朦朦,2015;van Lange et al., 2014;王沛,陈莉,2011),亦是一种与公平有关的人格特质(Gollwitzer & van Prooijen, 2016);因此,本研究将社会价值取向作为控制变量,用经典的“三优势量表”加以测量(刘朦朦,2015;van Lange, De Bruin, Otten, & Joireman, 1997)。

为排除被试现实中对自身学校的态度及其在校内食堂真实就餐行为可能对实验情境产生的投射性影响,控制变量中还包括被试平均每周在S大学(被试母校)校内食堂的用餐次数(按每日三餐来计算;最少0次,最多21次);对S大学校方的满意度和可信度,如“总体上讲,你如何评价S大学校方的可信程度”,选项从“1 很不可信”至“5 很可信”以及人口统计学变量中的性别。

3.2 结果

150名被试中,有3名被试的情境测试题⁴回答有误,故将这3名被试的数据删除。剩余的147个

有效样本中,男生53名,女生94名。

采用SPSS 21.0和AMOS 21.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具体而言,采用SPSS 21.0进行操纵检验、描述统计和方差分析,采用AMOS 21.0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技术考察社会公平通过机构信任作用于公共合作意向的双路径机制,对图1的理论模型进行拟合。

3.2.1 操纵检验

分配公平操纵的有效性通过比较分配公平高低两组的分配公平分数来检验。本实验中,分配公平的均值为3.52($SD = 1.27$)。对高低两组的分配公平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低分配公平组的分数($M = 2.62, SD = 1.05$)显著低于高分配公平组($M = 4.42, SD = 0.70$), $t(126) = -12.22, p < 0.001$, Cohen's $d = -2.02$ 。因此,实验对“分配公平”这一变量的操纵是有效的。

程序公平操纵的有效性通过比较程序公平高低两组的程序公平分数来检验。本实验中,程序公平的均值为2.82($SD = 1.22$)。对高低两组的程序公平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低程序公平组的分数($M = 1.82, SD = 0.64$)显著低于高程序公平组($M = 3.79, SD = 0.79$), $t(145) = -16.55, p < 0.001$, Cohen's $d = -2.73$ 。因此,实验对“程序公平”这一变量的操纵是有效的。

3.2.2 变量间相关与区分效度

表2展示了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和相关关系。其中,第7项至第11项为控制变量:“社会价值取向”的统计结果为竞争取向的9人,个人主义取向的58人,合作取向的75人。另有5人在9道题的选项中选择次数均没有达到6次,故不能确定个体的社会价值取向类型(van Lange et al., 1997)。由于竞争取向的个体人数较少,按照实际处理的惯例,将竞争取向和个人主义取向统归到亲自我取向类型中,而选择合作则代表被试是亲社会取向(刘朦朦,2015)。因此,表2中的社会价值取向最终划分为亲自我取向(67人)和亲社会取向(75人)。从表2中可看出,各控制变量与公共合作态度和行为意向的相关均不显著,因此,后续分析中不再涉及这5个控制变量。

由表2可初步知晓,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与因变量——公共合作意向显著正相关($p < 0.001$),稍后的分析中会对这两个变量的作用详加阐述。此外,公共合作态度与行为意向的相关也达到0.60($p < 0.001$)。

⁴ 情境测试题置于问卷一首,要求被试回答,“根据上述校方的分配方案,作为A大学的一名在校本科生:如果接受,则你获得___元,同时校方获得___元/人;如果拒绝,则你获得___元,同时校方获得___元/人。”

表 2 描述统计结果及变量间相关(实验 1)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 分配公平操纵	—	—										
2 程序公平操纵	—	—	0.007									
3 工具信任	3.31	0.73	0.35***	0.16*								
4 动机信任	2.83	0.73	0.19*	0.33***	0.36***							
5 公共合作态度	3.24	1.20	0.26**	0.30***	0.49***	0.30***						
6 公共合作意向	165	216.66	0.44***	0.29***	0.44***	0.37***	0.60***					
7 社会价值取向 ^a	—	—	0.08	-0.04	-0.02	0.06	0.07	0.02				
8 食堂用餐次数	15	4.08	-0.03	-0.13	-0.08	0.007	0.05	-0.001	-0.02			
9 S 大学满意度	3.41	0.68	-0.05	-0.002	0.24**	0.17*	0.04	-0.006	0.08	-0.06		
10 S 大学可信度	3.73	0.67	-0.19*	-0.002	0.08	0.05	0.02	0.03	-0.07	-0.03	0.55***	
11 性别 ^b	—	—	0.08	0.06	-0.03	0.23**	-0.01	0.05	-0.09	0.10	0.04	0.11

注: $n = 147$; ^a 该变量编码为 1 = 亲自我取向; 2 = 亲社会取向。 ^b 该变量编码 1 = 男性; 2 = 女性。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一般而言, 在讨论变量间因果关系之前, 研究者希望看到这些变量在测量上是准确的、可加以区分的(梁建, 樊景立, 2012), 故对工具信任与动机信任的区分效度进行检验。两因素 CFA 分析显示, Standardized RMR = 0.05, $\chi^2 = 16.68$, $df = 8$, $p = 0.03$; 机构信任单因素 CFA 分析显示, Standardized RMR = 0.14, $\chi^2 = 90.47$, $df = 9$, $p < 0.001$ 。后者的卡方值与前者相减, 自由度亦相减, 得 $\chi^2 = 73.78$, $df = 1$, 查卡方分布表, $p = 0.005$ 水平, 自由度为 1 的卡方值为 7.88。73.79 显著大于 7.88 ($p < 0.01$)。因此, 实验 1 将机构信任区分为工具信任与动机信任是合适的, 二者的区分效度良好。

3.2.3 社会公平对公共合作态度的影响

为验证 H1 和 H2, 以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为自变量, 以公共合作态度为因变量, 进行 2×2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分配公平的主效应显著, $F(1, 145) = 11.54$, $p < 0.01$, $\eta^2 = 0.07$; 程序公平的主效应显著, $F(1, 145) = 15.61$, $p < 0.001$, $\eta^2 = 0.09$; 二者的交互效应不显著, $F(1, 145) = 0.50$, $p = 0.48$, $\eta^2 < 0.01$ 。

因此, H1 和 H2 得证, 即从态度上看, 分配公平高的个体比分配公平低的个体更加支持公共合作; 程序公平高的个体比程序公平低的个体更加支持公共合作。社会公平对公共合作态度的正效应显著。

3.2.4 机构信任对社会公平—公共合作意向关系的中介

由于机构信任分为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 因此验证 H3 至 H7 就涉及到多重中介模型(multiple mediator models)的建构。根据图 1 的理论模型对组织情境下公共合作的双路径模型进行拟合。因为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是实验操纵变量, 所以需要虚拟编码后再进入模型(李茂能, 2011)。结果如下:

$\chi^2 = 0.01$, $df = 1$, $p = 0.94$; CFI = 1.00, NFI = 1.00, RMSEA < 0.01。模型拟合系数表明, 该结构模型拟合情况十分理想(Hu & Bentler, 1999; 侯杰泰, 温忠麟, 成子娟, 2004)。对公共合作意向的解释方差 $R^2 = 0.36$ 。变量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详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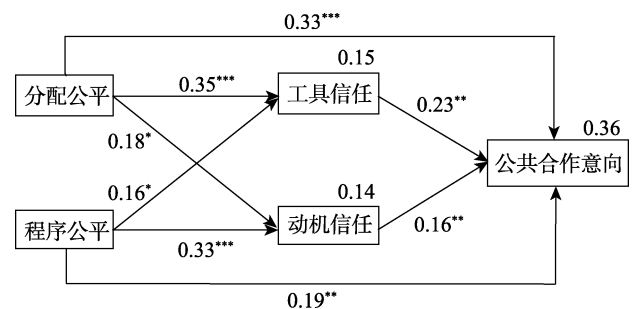


图 2 组织情境下公共合作的双路径模型

注: $n = 147$;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由图 2 可知, 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同时正作用于个体的公共合作行为意向, 路径系数分别是 0.33 ($p < 0.001$)和 0.19 ($p < 0.01$), 因此, H3 得证。同时可见, 工具信任部分中介了社会公平感(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与公共合作意向的关系; 动机信任亦部分中介社会公平感(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与公共合作意向的关系。进一步对该中介效应做 bootstrap 检验(Li, Jiang, Yao, & Li, 2013; 江程铭, 李纾, 2015), 见表 3。

表 3 显示用 AMOS 21.0 进行的 bootstrap 检验结果(置信区间为 90%)。由表可知, 分配公平通过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作用于公共合作意向的中介效应显著($\beta = 0.111$, $p < 0.05$), 置信区间不包含 0; 程序公平通过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作用于公共合作意向的中介效应亦显著($\beta = 0.089$, $p < 0.05$), 置

表 3 工具信任与动机信任的间接效应(实验 1)

关系	间接效应(90%置信区间; 中介变量为“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	间接效应通过	
		工具信任	动机信任
分配公平→公共合作意向	0.111* (0.054, 0.195)	0.082 (0.034, 0.139)	0.029 (0.003, 0.064)
程序公平→公共合作意向	0.089* (0.031, 0.140)	0.037 (0.006, 0.078)	0.052 (0.010, 0.102)

注: * $p < 0.05$ 。

信区间不包含 0。因此, $H4$ 和 $H5$ 得证。

接下来在双路径模型成立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中介作用的大小(温忠麟, 刘红云, 侯杰泰, 2012; 温忠麟, 叶宝娟, 2014; 张书维, 2013b)。根据表 3 所示, 分配公平通过工具信任影响公共合作意向的中介效应为 0.082; 分配公平通过动机信任影响公共合作意向的中介效应为 0.029。Mplus 检验显示二者差异不显著($p > 0.10$)。因此, $H6$ 没有得证。同理, 根据表 3 所示, 程序公平通过动机信任影响公共合作意向的中介效应为 0.052; 程序公平通过工具信任影响公共合作意向的中介效应为 0.037。Mplus 检验显示二者差异不显著($p > 0.10$)。因此, $H7$ 没有得证。

3.3 讨论

本实验在组织情境下探讨了社会公平感对公共合作意向的作用: 无论是分配公平还是程序公平, 高公平感知的个体比低公平感知的个体更愿意参与组织机构倡导的公共合作。这一结果再次证实了社会公平感是公共合作的前提。此外, 利用 UG 和 IG, 成功实现了在组织情境下对“社会公平”的操纵。如图 2 所示, 本研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建立起公共合作的双路径模型。当然, 由于本实验的组织选取的是“高校”这一非营利性的教育机构, 被试所启动的“高校学生”这一身份也异于组织的普通员工, 因此, 研究结论推广至营利性组织(如企业)内部员工与机构的互动情境时需谨慎。更进一步, 当个体突破组织-成员关系的束缚而置身于更一般化的社会情境下, 面对政府机构这一更强势和权威的机构时, 公共合作的双路径模型是否仍然成立? 实验 2 将回答这个问题。

4 实验 2: 社会情境下公共合作的双路径模型

实验 1 证实了社会公平感经由机构信任影响公共合作意向的双路径模型在组织情境下的有效性。实验 2 希望把这一模型推广到社会情境, 当与个体互动的机构由组织变为政府时, 图 1 所展示的理论模型是否仍能适用? 换言之, 实验 2 将在社会情境下对 $H1-H7$ 加以检验。

4.1 方法

4.1.1 被试

被试为 169 名 S 大学选修《管理学》必修课的公共管理类大一本科生, 平均年龄 18.7 岁($SD = 0.89$), 男 56 名, 女 113 名。参与本实验是这门课程的一个必修环节。

4.1.2 实验程序与材料

本实验仍为 2(分配公平: 高, 低) \times 2(程序公平: 高, 低)被试间设计。因变量同样是公共合作行为意向。

被试被随机分配到 4 个实验条件下, 实验程序与实验 1 并无二致, 但社会公平的操纵有所区别。“就业问题”作为大学生普遍关注的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 是研究学生个体与政府机构互动的理想启动材料(张书维, 2013a)。置身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⁵, 实验情境的设置也紧紧围绕高校毕业生的自主创业展开, 以提高被试的卷入度。材料中 A 市政府决定在其下辖的 D 区进行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试点, 拟拨付一笔总额 1 亿元的专项经费予以支持。为了充分调动试点区域开展工作的积极性, D 区可自留部分经费用于必要的行政支出; 但这 1 亿经费须以适当比例惠及 D 区内的每位高校应届毕业生。D 区政府经过研究提出的分配方案中的分配比例与分配规则同实验 1, 只不过金额变为: 个人获得 1000 元(10%)或 9000 元(90%)的创业启动金; 相应的, D 区政府获得 9000 元/人(90%)或 1000 元/人(10%)的行政经费(分配公平操纵)。程序公平的操纵仍体现在 UG 和 IG 范式下被试拒绝对分配结果的影响。限于篇幅, 不再展开⁶。

⁵ 该口号由李克强总理于 2014 年 9 月 10 日的“2014 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正式提出, 详见 http://www.gov.cn/xinwen/2014-12/26/content_2796967.htm。本实验于 2015 年 1 月进行。

⁶ 为保证“专款专用”, 防止被试“骗取”启动金, 实验材料中特别说明: 如果毕业生于当年实现非自主创业途径的就业(被用人单位雇佣, 以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为准)或异地自主创业, 则不享受这笔启动金, 已获得的也将被追回。另悉, 根据广东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 2016 年部省属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领指南的通知》(粤人社函〔2016〕184 号)要求, 给予符合要求的补贴对象按 1500 元/人的标准一次性发放。详见 <http://www.gdhrss.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djj/tzgg/201601/56352.html>

表 4 描述统计结果及变量间相关(实验 2)

变量	<i>M</i>	<i>SD</i>	1	2	3	4	5	6	7	8
1 分配公平操纵	—	—								
2 程序公平操纵	—	—	-0.02							
3 工具信任	3.01	0.90	0.43***	0.16*						
4 动机信任	2.75	0.83	0.16*	0.21**	0.46***					
5 公共合作态度	3.16	1.17	0.35***	0.24**	0.58***	0.53***				
6 公共合作意向	2548.85	3665.22	0.40***	0.21**	0.49***	0.39***	0.59***			
7 社会价值取向 ^a	—	—	-0.09	0.001	0.10	0.04	0.09	0.02		
8 毕业创业意愿 ^b	—	—	0.07	-0.01	-0.04	-0.11	-0.01	-0.002	-0.04	
9 性别 ^c	—	—	0.02	-0.004	0.03	0.04	0.11	0.02	-0.08	0.12

注: $n=165$; ^a该变量编码为 1 = 亲自我取向; 2 = 亲社会取向。 ^b该变量编码 1 = 是; 2 = 否。 ^c该变量编码 1 = 男性; 2 = 女性。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收集公共合作行为意向的材料是一个关于为毕业生自主创业捐资的公共物品困境——设立一个名为“阳光创业”的公共基金, 用于扶持自主创业的毕业生, 具体规则与研究一的食堂情境相同, 不再赘述。

4.1.3 变量操纵与测量

所有题项同实验 1, 仅变换被试的身份(作为 D 区某高校的一名应届本科毕业生)和互动对象(D 区政府)。

分配公平自变量操纵检验: “作为 D 区某高校的一名应届本科毕业生, 你觉得按照 D 区政府所提出的分配比例, 你所得的结果是否公平”。

程序公平自变量操纵检验: “作为 D 区某高校的一名应届本科毕业生, 你觉得按照 D 区政府所遵循的分配规则, 你受到的对待是否公平”。

工具信任 3 个题项(Tyler, 2011b; $\alpha = 0.87$), 如“我认为 D 区政府能够制定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动机信任 3 个题项(Tyler, 2011b; $\alpha = 0.79$), 如“我相信 D 区政府所做是为了最好地维护像我这样的高校应届毕业生的利益”。

公共合作态度的收集, 询问被试: “D 区某高校的一名应届本科毕业生, 你支持 D 区政府设立‘阳光创业’公共基金吗”。

公共合作行为意向的收集, 询问被试: D 区某高校的一名应届本科毕业生, 你愿意捐出____元(≥ 0 的任意金额)设立“阳光创业”公共基金。

此外, 选取社会价值取向、毕业后创业意愿(“大学毕业后, 你是否会考虑自主创业”)以及性别作为控制变量⁷。

⁷ 考虑到被试均为(低年级)本科在读, 基本无与 S 大学所在的地方政府打交道的经历; 因此, 实验 2 没再测量被试对本地政府的满意度和可信度, 以保证问卷题项设置的合理自然。

4.2 结果

169 名被试中, 有 4 名被试的情境测试题回答有误, 故将这 4 名被试的数据删除。剩余的 165 个有效样本中, 男生 55 名, 女生 110 名。

实验 2 采取的数据分析方法与实验 1 相同。

4.2.1 操纵检验

分配公平操纵的有效性通过比较分配公平高低两组的分配公平分数来检验。本实验中, 分配公平的均值为 2.93 ($SD = 1.38$)。对高低两组的分配公平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 低分配公平组的分数 ($M = 1.93$, $SD = 0.79$) 显著低于高分配公平组 ($M = 3.95$, $SD = 1.08$), $t(149) = -13.74$, $p < 0.001$, Cohen's $d = -2.14$ 。因此, 实验对“分配公平”这一变量的操纵是有效的。

程序公平操纵的有效性通过比较程序公平高低两组的程序公平分数来检验。本实验中, 程序公平的均值为 2.79 ($SD = 1.06$)。对高低两组的程序公平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 低程序公平组的分数 ($M = 2.08$, $SD = 0.78$) 显著低于高程序公平组 ($M = 3.50$, $SD = 0.81$), $t(163) = -11.44$, $p < 0.001$, Cohen's $d = -1.78$ 。因此, 实验对“程序公平”这一变量的操纵是有效的。

4.2.2 变量间相关与区分效度

表 4 展示了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和相关关系, 其中, 第 7 项至第 9 项为控制变量: “社会价值取向”的统计结果为竞争取向的 6 人, 个人主义取向的 60 人, 合作取向的 93 人, 另有 6 人的社会价值取向类型未定。将竞争取向和个人主义取向统归到亲自我取向类型中, 表 4 中的社会价值取向最终划分为亲自我取向(66 人)和亲社会取向(93 人)。

从表 4 中可看出, 各控制变量与公共合作态度和行为意向的相关均不显著, 因此, 后续分析中不

再涉及这3个控制变量。由表4可初步知晓,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与因变量——公共合作意向显著正相关($p < 0.001$),稍后的分析中会对这两个变量的作用详加阐述。此外,公共合作态度与行为意向的相关也达到0.59 ($p < 0.001$)。

继续对实验2中工具信任与动机信任的区分效度进行检验。两因素CFA分析显示, Standardized RMR = 0.01, $\chi^2 = 0.88$, $df = 8$, $p = 1.00$; 机构信任单因素CFA分析显示, Standardized RMR = 0.13, $\chi^2 = 97.63$, $df = 9$, $p < 0.001$ 。后者的卡方值与前者相减,自由度亦相减,得 $\chi^2 = 96.75$, $df = 1$,查卡方分布表, $p = 0.005$ 水平,自由度为1的卡方值为7.88。96.75显著大于7.88 ($p < 0.01$)。因此,与实验1的结果一致,实验2将机构信任区分为工具信任与动机信任是合适的,二者的区分效度良好。

4.2.3 社会公平对公共合作态度的影响

为验证H1和H2,以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为自变量,以公共合作态度为因变量,进行2×2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分配公平的主效应显著, $F(1, 163) = 25.25$, $p < 0.001$, $\eta^2 = 0.13$; 程序公平的主效应显著, $F(1, 163) = 11.91$, $p < 0.01$, $\eta^2 = 0.06$; 二者的交互效应不显著, $F(1, 163) = 0.25$, $p = 0.62$, $\eta^2 < 0.01$ 。

因此,H1和H2得证,即从态度上看,分配公平高的个体比分配公平低的个体更加支持公共合作;程序公平高的个体比程序公平低的个体更加支持公共合作。社会公平对公共合作态度的正效应显著。

4.2.4 机构信任对社会公平—公共合作意向关系的中介

根据图1的理论模型对社会情境下公共合作的双路径模型进行拟合。结果如下: $\chi^2 = 0.05$, $df = 1$, $p = 0.82$; CFI = 1.00, NFI = 1.00, RMSEA < 0.01。模型拟合系数表明,该结构模型拟合情况良好。对公共合作意向的解释方差 $R^2 = 0.34$ 。变量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详见图3。

由图3可知,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同时正作用于个体的公共合作行为意向,路径系数分别是0.26 ($p < 0.001$)和0.13 ($p < 0.05$),因此,H3得证。同时可见,工具信任部分中介了社会公平(分配公平和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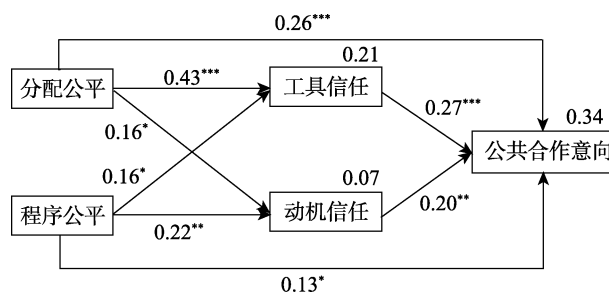


图3 社会情境下公共合作的双路径模型

注: $n = 165$;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公平)与公共合作意向的关系;动机信任亦部分中介社会公平(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与公共合作意向的关系。进一步对该中介效应做bootstrap检验,见表5。

表5显示用AMOS 21.0进行的bootstrap检验结果(置信区间为90%)。由表可知,分配公平通过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作用于公共合作意向的中介效应显著($\beta = 0.147$, $p < 0.05$),置信区间不包含0;程序公平通过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作用于公共合作意向的中介效应亦显著($\beta = 0.087$, $p < 0.05$),置信区间不包含0。因此,H4和H5得证。

接下来在双路径模型成立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中介作用的大小。根据表5所示,分配公平通过工具信任影响公共合作意向的中介效应为0.115;分配公平通过动机信任影响公共合作意向的中介效应为0.032。Mplus检验显示二者差异不显著($p > 0.10$)。因此,H6没有得证。同理,根据表5所示,程序公平通过动机信任影响公共合作意向的中介效应为0.044;程序公平通过工具信任影响公共合作意向的中介效应为0.043。Mplus检验显示二者差异不显著($p > 0.10$)。因此,H7没有得证。

4.3 讨论

实验2在社会情境下探讨了社会公平感对公共合作意向的作用:无论是分配公平还是程序公平,高公平感知的个体比低公平感知的个体更愿意参与政府机构倡导的公共合作。这一结果将实验1的结论适用范围由组织扩展至社会。此外,利用UG和IG,成功实现了在社会情境下对“社会公平”的操纵。如图3所示,本研究在社会层面检验了公共合作的双路径模型。

表5 工具信任与动机信任的间接效应(实验2)

关系	间接效应(90%置信区间; 中介变量为“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	间接效应通过	
		工具信任	动机信任
分配公平→公共合作意向	0.147* (0.084, 0.203)	0.115 (0.055, 0.182)	0.032 (0.005, 0.069)
程序公平→公共合作意向	0.087* (0.036, 0.140)	0.043 (0.011, 0.086)	0.044 (0.012, 0.084)

注: * $p < 0.05$ 。

本实验的被试均为在校本科生,日常生活中缺乏与当地政府打交道的实际经验。因此,在行为意向上容易表现出理想化和两极分化的特点($M = 2548.85, SD = 3665.22$)。推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历来就是中国政府就业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张书维, 2013a), 由于合作情境是有关高校毕业生的创业支持, 在校生作为潜在的受惠群体, 对于此的看法是最有前瞻性的。这有利于增强研究结论的预测力。

5 总讨论

本研究通过一个预实验和两个实验室情境设计的系列实验, 巧妙利用最后通牒博弈和免责博弈范式操纵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此操纵的有效性在 3 个实验中均得到有力证明, 具备较高的推广价值), 探讨了公共物品困境下个体感知的社会公平影响公共合作意向的动力机制。结果表明, 首先从态度上看, 分配公平高的个体比分配公平低的个体更加支持公共合作; 程序公平高的个体比程序公平的个体更加支持公共合作。其次本研究最重要的发现和主要理论贡献是在组织层面以及社会层面上建立起“公共合作的双路径模型”: 外部路径由分配公平产生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 进而触发公共合作; 内部路径由程序公平产生动机信任和工具信任, 进而触发公共合作。这其中, 外部路径可视为“拉力”, 内部路径可视为“推力”, 二者结合构成个体参与公共合作的双动力系统。由模型可知, 分配公平对公共合作意向的总影响为 0.44⁸ (实验 1)和 0.41⁹ (实验 2); 程序公平对公共合作意向的总影响为 0.28¹⁰ (实验 1)和 0.22¹¹ (实验 2); 前者大于后者。这一结果表明, 分配公平较之程序公平, 更能影响个体的合作意愿。另一方面, 工具信任对公共合作意向的影响(实验 1, $\beta = 0.23, p < 0.01$; 实验 2, $\beta = 0.27, p < 0.001$)大于动机信任(实验 1, $\beta = 0.16, p < 0.01$; 实验 2, $\beta = 0.20, p < 0.01$)。这一结果说明, 能力受到个体信任的机构, 号召力更强。由上观之, 无论对于组织还是社会, 分配公平均主导着个体的公共合

作。工具信任与动机信任的中介效应没有显著差别, 一方面预示二者堪比公共合作的“双引擎”, 对于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影响公共合作意向的关系而言, 不可偏废; 另一方面也说明, 中介起作用的机制可能比预想的更加复杂, 对涉及中介效应大小的评估和比较应更加审慎。

另外, 比较公共合作态度在高分配公平低程序公平组(实验 1, $M = 3.25, SD = 1.32$; 实验 2, $M = 3.33, SD = 1.18$)与低分配公平高程序公平组(实验 1, $M = 3.35, SD = 1.16$; 实验 2, $M = 3.05, SD = 1.05$)上的差异, 发现并不显著: 实验 1, $t(69) = 0.35, p = 0.73$; 实验 2, $t(81) = -1.18, p = 0.24$ 。这一方面说明分配公平与程序不公, 分配不公与程序公平之间对于合作态度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补偿效应; 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只要存在一种不公, 就会影响到个体的公共合作态度。

公共合作双路径模型的价值体现在首次探明了个体对于机构“信什么”、“为何信”及“信之果”三个基本问题间的因果路径, 并且进一步揭示出不同路径间的作用效果。就实验结果来看, 外部拉力的作用大于内部推力。类似的, 来自另一个大样本的抽样调查研究显示, 作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影响中国居民幸福感的两大因素, 分配公平的作用大于程序公平(蒋丽, 李锋, 方健雯, 2017)。该研究从心理体验(幸福感)角度, 本研究从行为意向(公共合作)出发, 均揭示出社会公平在东西方的不同机制。近来, 管理学界的有识之士通过各种渠道呼唤构建适宜于东方化情境的“本土管理理论”(Barkema, Chen, George, Luo, & Tsui, 2015; 徐淑英, 任兵, 吕力, 2016)。本文可视为对这一趋势的积极响应——从组织和社会不同层面检验“西方情境下建立的公平原则在中国是否适用”这一理论问题的边界条件(陈昭全, 张志学, 2012)。当然, 现实中个体面对自己隶属和熟悉的机构, 互动时可能会投入更多情感, 因而内部推力的作用也会相应增大。双路径模型的适用性在组织情境和社会情境下均得到了支持。此外, 把最后通牒博弈和免责博弈的决策范式开创性地引入社会公平研究领域, 从而将博弈关系从人际互动扩展到人与机构的互动, 是建立双路径模型之外本研究在方法上的又一贡献。“旧瓶装新酒”, 用两个决策范式来操纵社会公平的做法可谓基于传统又有所突破。“基于传统”体现在最后通牒博弈操纵分配(结果)公平, “有所突破”体现在免责博弈操纵程序(规则)公平。对这一范式改造迁移的成功尝试,

⁸ 包括直接影响 0.33, 通过工具信任中介的间接影响 0.082 和通过动机信任中介的间接影响 0.029 (见图 2 和表 3)。

⁹ 包括直接影响 0.26, 通过工具信任中介的间接影响 0.115 和通过动机信任中介的间接影响 0.032 (见图 3 和表 5)。

¹⁰ 包括直接影响 0.19, 通过动机信任中介的间接影响 0.052 和通过工具信任中介的间接影响 0.037 (见图 2 和表 3)。

¹¹ 包括直接影响 0.13, 通过动机信任中介的间接影响 0.044 和通过工具信任中介的间接影响 0.043 (见图 3 和表 5)。

必将有利于在组织乃至社会层面检验个体决策的微观机制，而这可能成为未来决策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本研究涉及的合作对象涵盖了政府之外的组织机构与政府机构自身，组织机构以高校而非企业为代表，正是基于公共合作的“公共性”。从性质上说，公共合作追求的是公共利益，这与政府和公立教育机构的宗旨完全一致。也正因为合作对象均为“官方”机构，研究中用于测量公共合作(态度和意向)的公共物品困境不完全等同于传统的实验范式。表现在：首先，无论是实验1为“平价食堂”公共基金捐款还是实验2为“阳光创业”公共基金捐款，对所有被试来说，分享的是未来受益的均等机会而非与现金报酬关联的实验代币。不过二者的本质并无区别，都属于捐资后人人均可享有的公共物品¹²，且满足前述社会困境的两个基本属性。其次，本研究对于被试的捐款数额没有设置上限，这一方面是基于减少限制排除干扰的考虑，因为在决定是否捐款前个体分配到的资金差异明显，低分配公平条件下的被试所得(实验1为40元；实验2为1000元)远少于高分配公平条件下的所得(实验1为360元；实验2为9000元)¹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为了提高实验结果的外部效度。现实中，但凡公益捐款只求多多益善。

尽管本研究并不关注接收者对于分配方案的选择，但实验结果却一致地显示出较高的接受率(实验1的总体接受率为92.5%；实验2的总体接受率为85.5%)。即使在最不公平的条件下(低分配公平和低程序公平)，被试选择接受的比例也高于75%。结合预实验的结果，可以认为当个体与机构互动时，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理性动机占了上峰；此外，由于博弈对象是组织或政府，机构的权威性也会影响个体的服从与合作(迈尔斯, 2014)。以上两点充分说明人际互动与人机互动的不同，可由近年来全国各地城市大规模拆迁中只有极少数“钉子户”的现实中得到印证。这也从侧面说明为什么公共合作的双路径模型中外部路径影响大于内部路径，个体认知的工具理性是关键。从另一个角度看，尽管

只有少量的接收者拒绝不公平的方案，但大多数接收者选择接受的同时并不意味着他/她就觉得公平：实验1中低分配公平组的分数($M = 2.62, SD = 1.05$)和低程序公平组的分数($M = 1.82, SD = 0.64$)以及实验2中低分配公平组的分数($M = 1.93, SD = 0.79$)和低程序公平组的分数($M = 2.08, SD = 0.78$)，均没有达到选项的中值3。这一结果可以成为“不平等规避”解释的一个推广：以往研究都关注那些拒绝者的行为及心理——拒绝“寡”因恨“不均”；而本研究却发现接受者相反的选择背后却存在类似的心理——接受“寡”亦恨“不均”。这折射出接受者的相对剥夺感，形象地说就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Zhang, Wang, & Chen, 2011)。如果说行为决策领域聚焦的是与拒绝相关的不公平感(injustice)，本研究则将视野拓展至与接受相关的不公平感。由于互动对象的不同及双方地位的差异，相似的不公平感竟能导致相反的行为抉择。未来研究可以继续挖掘社会情境下“不平等规避”这一共性背后的心理及神经机制(罗艺等, 2013；王赟等, 2015)，以及在此过程中存在的情绪唤起，如生气(anger)、义愤(outrage)等(Gollwitzer & van Prooijen, 2016)。

本研究的局限有以下三点：第一，尽管来自社会心理学的证据一再显示行为意向对于行为有着良好的替代性，但对公共合作意向的观测不等于现实中的公共合作。受制于各种因素，实验中不可能让被试真正捐助出一定数量的现金。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双路径模型对于公共合作真实行为的解释力。第二，实验中选取了被试最熟悉和相关的情境以确保个体的卷入度，然而高校学生自身的特殊性使得研究结论推广至其他社会群体时需谨慎。未来研究可以在各种群体中检验公共合作双路径模型的适用性。第三，本研究仅考察了社会公平感经由机构信任作用于公共合作意向的机制，事实上，决定个体参与公共合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未来研究可以考察其他正式因素(如决策透明度)和非正式因素(如组织和社会认同)对公共合作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初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追求”¹⁴；可见，社会公平是贯穿于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理念(郭永玉等, 2017)。同时，对于公共合作产生过程之社会心理因素的探讨势必有利于完整解答“合作行为是如何进

¹² 即便对于不在校内食堂用餐的被试(实验1)或不打算毕业后自主创业的被试(实验2)，实验情境中的机会对于他们来讲，也是均等和开放的，只要他们愿意即可享有。

¹³ 钱数多少并不会直接影响到个体的捐款意向。虽然实验伊始的分配停留在纸面，没有让被试感受到“真金白银”；但至少在心理账户上，已经让他们“名正言顺”地拥有了这笔钱。因此，最后的捐款意味着是把自己的钱往外掏。

¹⁴ 详见<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109/c70731-24064538.html>

化的”这一当今人类最具挑战性的科学问题(王赟等, 2016)。本研究将二者结合, 证实了社会公平是公共合作的前提, 机构信任是公共合作的诱因。实践方面, 无论是组织还是政府的管理者, 不能仅满足于让组织和社会成员遵循规则, 这只是义务; 应在此基础上谋求他们为了群体利益的自愿合作(Tyler, 2016)。而促进个体参与公共合作的根本在于最大程度的确保分配资源时的分配(结果)公平和程序(规则)公平, 并尽可能提高个体的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只有这样, 才能化解“社会不满”(王二平, 周洁, 张书维, 2015), 增强政府信任(张书维, 2016), 实现机构与个体间的良性互动。本研究的结论或可将《淮南子》之言明晰为: 公正无私, 取信于民, 一言而万民齐。

致谢: 特别感谢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周洁副研究员在实验设计和论文修改阶段的专业建议以及段斌同学在统计分析时的热情协助; 同时诚谢匿名审稿人和编委提出的宝贵意见。

参 考 文 献

- Ajzen, I., & Fishbein, M. (1980). *Understanding attitudes and predicting social behavio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Aryee, S., Budhwar, P. S., & Chen, Z. X. (2002). Trust as a mediat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nd work outcomes: Test of a social exchange mode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3(3), 267-285.
- Avery, D. R., & Quiñones, M. A. (2002). Disentangling the effects of voice: The incremental roles of opportunity, behavior, and instrumentality in predicting procedural fairnes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7(1), 81-86.
- Balliet, D., Parks, C., & Joireman, J. (2009).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social dilemmas: A meta-analysis.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12(4), 533-547.
- Balliet, D., & van Lange, P. A. M. (2013). Trust,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9(5), 1090-1112.
- Barkema, H. G., Chen, X. P., George, G., Luo, Y. D., & Tsui, A. S. (2015). West meets east: New concepts and theor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8(2), 460-479.
- Barkworth, J. M., & Murphy, K. (2015). Procedural justice policing and citizen compliance behaviour: The importance of emotion. *Psychology, Crime & Law*, 21(3), 254-273.
- Bianchi, E. C., Brockner, J., van den Bos, K., Seifert, M., Moon, H., van Dijke, M., & De Cremer, D. (2015). Trust in decision-making authorities dictates the form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come fairness and procedural fairnes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1(1), 19-34.
- Bies, R. J., & Moag, J. F. (1986). Interactional justice: Communication criteria of fairness. In R. J. Lewicki, B. H. Sheppard, & M. H. Bazerman (Eds.), *Research on negotiation in organizations* (Vol. 1, pp. 43-55).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Bøggild, T. (2016). How politicians' reelection efforts can reduce public trust, electoral support, and policy approval. *Political Psychology*, 37(6), 901-919.
- Bolton, G. E., & Zwick, R. (1995). Anonymity versus punishment in ultimatum bargaining.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10, 95-121.
- Castillo, J. C., Palacios, D., Joignant, A., & Tham, M. (2015). Inequality,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case of Chile. *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34(4), 486-502.
- Chanley, V. A., Rudolph, T. J., & Rahn, W. M. (2000).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public trust in government: A time series analysi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4(3), 239-256.
- Chen, X., Zhao, G. X., & Ye, H. S. (2014). The forms and functions of punishment in public-goods dilemma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1), 160-170.
- [陈欣, 赵国祥, 叶浩生. (2014). 公共物品困境中惩罚的形式与作用. *心理科学进展*, 22(1), 160-170.]
- Chen, X. P. (2013). *Solving social dilemmas: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of cooperation induction*. Beijing, China: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陈晓萍. (2013). *走出社会困境: 有效诱导合作的心理机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Chen, Y. F., Zhou, Y. A., & Song, Z. F. (2011). Inequality aversion or reciprocity?: An investigation of two kinds of fairness in the ultimatum game.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6), 31-44.
- [陈叶峰, 周业安, 宋紫峰. (2011). 人们关注的是分配动机还是分配结果?——最后通牒实验视角下两种公平观的考察. *经济研究*, (6), 31-44.]
- Chen, Z. Q., & Zhang, Z. X. (2012).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management research. In X. P. Chen, S. Y. Xu, & J. L. Fan (Eds.), *Empirical methods in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2nd ed., pp. 63-95). Beijing, China: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陈昭全, 张志学. (2012). 管理研究中的理论建构. 见 陈晓萍, 徐淑英, 樊景立(编), *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 (第2版, pp. 63-95).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Citrin, J., & Muste, C. (1999). Trust in government. In J. P. Robinson, P. R. Shaver, & L. S. Wrightsman (Eds.), *Measures of political attitudes* (pp. 465-532). San Diego, CA, US: Academic Press.
- Colquitt, J. A., Conlon, D. E., Wesson, M. J., Porter, C. O. L. H., & Ng, K. Y. (2001). Justice at the millennium: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25 years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research.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6(3), 425-445.
- Colquitt, J. A., Greenberg, J., & Zapata-Phelan, C. P. (2005). What is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 historical overview. In J. Greenberg & J. A. Colquitt (Eds.),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pp. 3-58).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Colquitt, J. A., Scott, B. A., & LePine, J. A. (2007). Trust, trustworthiness, and trust propensity: A meta-analytic test of their unique relationships with risk taking and job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2(4), 909-927.
- Colquitt, J. A., Scott, B. A., Rodell, J. B., Long, D. M., Zapata, C. P., et al. (2013). Justice at the millennium, a decade later: A meta-analytic test of social exchange and affect-based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8(2), 199-236.
- Colquitt, J. A., & Zapata, K. P. (2015). Justice, fairness, and employee reactions. *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 75-99.
- Cropanzano, R. S., & Ambrose, M. L. (2015). *The Oxford handbook of justice in the workpla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bove, S., Baumard, N., & André, J. B. (2016). Models of the evolution of fairness in the ultimatum game: A review and classification.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7(3), 245–254.
- De Cremer, D. (2004). The influence of accuracy as a function of leader's bias: The role of trustworthiness in the psychology of procedural justi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0(3), 293–304.
- Deutsch, M. (1985). *Distributive justice: A social-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Fang, N. (2013). *Study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culture, organization trust and organization citizenship behavior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in China*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 [方娜. (2013). 在华跨国公司企业文化、组织信任及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
- Fehr, E., & Gintis, H. (2007). Human motivation and social cooperation: Experimental and analytical founda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3, 43–64.
- Fehr, E., & Schmidt, K. M. (1999). A theory of fairnes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3), 817–868.
- Gao, J., & Ma, H. Y. (2011). The measurement and research operations of procedural justice. *Studies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9(3), 236–240.
- [高记, 马红宇. (2011). 程序公正的测量及研究操纵. *心理与行为研究*, 9(3), 236–240.]
- Glimcher, P. W., & Fehr, E. (2014). *Neuroeconomics: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brain* (2nd ed.). London: Academic Press.
- Gollwitzer, M., & van Prooijen, J-W. (2016). Psychology of justice. In C. Sabbagh & M. Schmitt (Eds.), *Handbook of social justice theory and research* (pp. 61–82). New York: Springer.
- Greenberg, J. (2011). Organizational justice: The dynamics of fairness in the workplace. In S. Zedeck (Ed.), *APA handbook of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Vol 3. Maintaining, expanding, and contracting the organization* (pp. 271–327).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Greenberg, J., & Colquitt, J. A. (2005).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Mahwah, NJ, US: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 Grimmelikhuijsen, S., & Knies, E. (2015). Validating a scale for citizen trust i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doi: 10.1177/0020852315585950
- Guo, C., & Giacobbe-Miller, J. K. (2015). Meanings and dimensions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in China: An inductive investigation.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11(1), 45–68.
- Guo, Y. Y., Yang, S. L., & Hu, X. Y. (2017). Ideal balance versus realistic ladder: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fairness researches based on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32(2), 117–127.
- [郭永玉, 杨沈龙, 胡小勇. (2017). 理想天平与现实阶梯: 心理学视角下的社会分层与公平研究. *中国科学院院刊*, 32(2), 117–127.]
- Güth, W., Schmittberger, R., & Schwarze, B. (1982).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ultimatum bargaining.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3(4), 367–388.
- Hamm, J. A., Lee, J., Trinkner, R., Wingrove, T., Leben, S., & Breuer, C. (2016). On the cross-domain scholarship of trust in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In E. Shockley, T. M. S. Neal, L. M. PytlikZillig, & B. H. Bornstein (Ed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trust: Towards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ntegration* (pp. 131–156). New York: Springer.
- Hau, K. T., Wen, Z. L., & Chen, Z. J. (2004).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s*. Beijing, China: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 [侯杰泰, 温忠麟, 成子娟. (2004). *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 Hetherington, M. J. (1999).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trust on the presidential vote, 1968–96.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3(2), 311–326.
- Hetherington, M. J. (2005). *Why trust matters: Declining political trust and the demise of American liber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ibbing, J. R., & Theiss-Morse, E. (2008). Voice, validation and legitimacy. In B. A. Sullivan, M. Snyder, & J. L. Sullivan (Eds.), *Cooperation: The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effective human interaction* (pp. 123–142).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Hu, L. T., & Bentler, P. M. (1999). Cutoff criteria for fit indexes in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Conventional criteria versus new alternativ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6(1), 1–55.
- Huq, A. Z., Tyler, T. R., & Schulhofer, S. J. (2011). Why does the public cooperate with law enforcement? The influence of the purposes and targets of policing? *Psychology, Public Policy, and Law*, 17(3), 419–450.
- Jasso, G., Törnblom, K. Y., & Sabbagh, C. (2016).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C. Sabbagh & M. Schmitt (Eds.), *Handbook of social justice theory and research* (pp. 201–218). New York: Springer.
- Jiang, C. M., & Li, S. (2015). Mediation analysi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bootstrap in mediation analysis. *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 35(5), 458–463.
- [江程铭, 李纾. (2015). 中介分析和自举(Bootstrap)程序应用. *心理学探新*, 35(5), 458–463.]
- Jiang, L., Li, F., Fang, J. W. (2017). Can urbanization be good for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A multilevel study of area- and individual-level factors. Under review.
- [蒋丽, 李锋, 方健雯. (2017). 城镇化能提升居民幸福感吗? ——基于区域和个体层面的多层模型研究. 审稿中.]
- Johnson, C., Hegtvædt, K. A., Khanna, N., & Scheuerman, H. L. (2016). Legitimacy processes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to injustic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79(2), 95–114.
- Jost, J. T., & Kay, A. C. (2010). Social justice: History, theory, and research. In S. T. Fiske, D. T. Gilbert, & G. Lindzey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5th ed., Vol. 2, pp. 1122–1165).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 Khodyakov, D. (2007). Trust as a process: A three-dimensional approach. *Sociology*, 41(1), 115–132.
- Kim, S. E. (2005). The role of trust in the modern administrative state: An integrative model.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37(5), 611–635.
- Konow, J., & Schwetzmman, L. (2016). The economics of justice. In C. Sabbagh & M. Schmitt (Eds.), *Handbook of social justice theory and research* (pp. 83–106). New York: Springer.
- Levi, M., & Stoker, L. (2000). Political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3(1), 475–507.
- Li, C. P., Wang, Z., & Mao, K. X. (2016). *Handbook of management research*. Beijing, China: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李超平, 王桢, 毛凯贤. (2016). *管理研究量表手册*.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Li, F., Jiang, L., Yao, X., & Li, Y. J. (2013). Job demands, job resources and safety outcomes: The roles of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safety compliance. *Accident Analysis and Prevention*, 51, 243–251.
- Li, J., & Wu, X. G. (2012). Income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urban residents' view of equity in transitional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3),

- 114-128.
- [李骏, 吴晓刚. (2012). 收入不平等与公平分配: 对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公平观的一项实证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 (3), 114-128.]
- Li, L. J. (2016). Reassessing trust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vidence from five national surveys. *The China Quarterly*, 225, 100-121.
- Li, M. N. (2011). *Graphic AMOS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academic research*. Chongqing, China: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 [李茂能. (2011). *图解 AMOS 在学术研究中的应用*.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 Li, S. (2016). *An equate-to-differentiate way of decision-making*. Shanghai, China: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李纾. (2016). *决策心理: 齐当别之道*.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Li, Y., Long, L. R., & Liu, Y. (2003).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research.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1), 78-84.
- [李晔, 龙立荣, 刘亚. (2003). 组织公正感研究进展. *心理科学进展*, 11(1), 78-84.]
- Li, Y. X. (2014). What kind of trust and why do we trus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status and origin of chinese political trust.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11(2), 16-26.
- [李艳霞. (2014). 何种信任与为何信任? ——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现状与来源的实证分析. *公共管理学报*, 11(2), 16-26.]
- Liang, J., & Fan, J. L. (2012). The measurement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 In X. P. Chen, S. Y. Xu, & J. L. Fan (Eds.), *Empirical methods in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2nd ed., pp. 323-355). Beijing, China: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梁建, 樊景立. (2012). 理念构念的测量. 见 陈晓萍, 徐淑英, 樊景立(编), *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 (第 2 版, pp. 323-355).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Lin, W. S., Gao, T., Sun, L. Y., & Jing, H. B. (2010). The mechanism of hidden-rule perspective in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3(4), 85-110.
- [林炜双, 高腾, 孙李银, 景怀斌. (2010). 作为组织政治行为的潜规则: 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 *公共行政评论*, 3(4), 85-110.]
- Lin, X. W., Che, H. S., Zhang, P., & Wang L. (2004). Procedural justice and its psychological dynamic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2), 264-272.
- [林晓婉, 车宏生, 张鹏, 王蕾. (2004). 程序公正及其心理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12(2), 264-272.]
- Lind, E. A. (2001). Fairness heuristic theory: Justice judgments as pivotal cognitions in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 In J. Greenberg & R. Cropanzano (Eds.), *Advances in organizational justice* (pp. 56-88).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nd, E. A., Kanfer, R., & Earley, P. C. (1990). Voice, control, and procedural justice: Instrumental and noninstrumental concerns in fairness judg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9(5), 952-959.
- Lind, E. A., & Tyler, T. R. (1988).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ocedural justice*. US: Springer.
- Liu, C. J., & Hao, F. (2011).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asymmetric social dilemmas.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3(4), 432-441.
- [刘长江, 郝芳. (2011). 不对称社会困境中社会价值取向对合作的影响. *心理学报*, 43(4), 432-441.]
- Liu, C. J., & Hao, F. (2014). Social dilemma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9), 1475-1484.
- [刘长江, 郝芳. (2014). 社会困境问题的理论架构与实验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22(9), 1475-1484.]
- Liu, M. M. (2015). *The effect of power and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on cooperatio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Peking University.
- [刘朦朦. (2015). *权力和社会价值取向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大学.]
- Long, L. R. (2004). Review and comment on heuristic fairness theory.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2), 447-454.
- [龙立荣. (2004). 公正的启发理论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 12(2), 447-454.]
- Long, L. R., & Liu, Y. (2004). Review and comment on organizational injustice.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4), 584-593.
- [龙立荣, 刘亚. (2004). 组织不公正及其效果研究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 12(4), 584-593.]
- Lu, J. (2014). A cognitive anatomy of political trust and respective bases: Evidence from a two-city survey in China. *Political Psychology*, 35(4), 477-494.
- Luo, Y., Feng, C. L., Gu, R. L., Wu, T. T., & Luo, Y. J. (2013). The fairness norm in social decision-making: Behavioral and neuroscience studie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2), 300-308.
- [罗艺, 封春亮, 古若雷, 吴婷婷, 罗跃嘉. (2013). 社会决策中的公平准则及其神经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21(2), 300-308.]
- Ma, L. (2016). How does E-government usage affect citizen trust: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and responsivenes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9(6), 44-63.
- [马亮. (2016). 电子政务使用如何影响公民信任: 政府透明与回应的中介效应. *公共行政评论*, 9(6), 44-63.]
- Mao, M. K. (2015). The ultimatum game experiments and their enlightenment on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hina. *East China Economic Management*, 29(5), 175-179.
- [毛孟凯. (2015). 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及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启示. *华东经济管理*, 29(5), 175-179.]
- Mayer, R. C., & Davis, J. H. (1999). The effect of the performance appraisal system on trust for management: A field quasi-experimen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4(1), 123-136.
- Mayer, R. C., Davis, J. H., & Schoorman, F. D. (1995).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trus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3), 709-734.
- Meng, T. G. (2012). Chinese people's perception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transitional China: Outcome justice and opportunity justice.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32(6), 108-134.
- [孟天广. (2012). 转型期中国公众的分配公平感: 结果公平与机会公平. *社会*, 32(6), 108-134.]
- Meng, T. G. (2014). Political trust in transitional China: Measurement approaches and overall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3(2), 1-10.
- [孟天广. (2014). 转型期的中国政治信任: 实证测量与全貌概览.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53(2), 1-10.]
- Miao, Q., Chen, S. J., Gong, Z., & Hong, Y. (2015). *Handbook of HRM frontier research & practice scales*. Hangzhou, China: Zhe Jiang University Press.
- [苗青, 陈思静, 宫准, 洪雁. (2015). *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与实践: 前沿量表手册*.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 Moliner, C., Cropanzano, R., & Martínez-Tur, V. (2017). *Organizational justic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and conceptual advances*. London: Routledge.
- Murphy, K., & Tyler, T. R. (2008). Procedural justice and compliance behaviour: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o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8(4), 652-668.
- Myers, D. G. (2014). *Social psychology* (11th ed.). Beijing, China: Posts & Telecom Press.
- [迈尔斯. (2014). *社会心理学* (侯玉波, 乐国安, 张智勇等

- 译, 第11版).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 Neal, T. M. S., PytlikZillig, L. M., Shockley, E., & Bornstein, B. H. (2016). Inspiring and advancing the many-disciplined study of institutional trust. In E. Shockley, T. M. S. Neal, L. M. PytlikZillig, & B. H. Bornstein (Ed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trust: Towards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ntegration* (pp. 1–16). New York: Springer.
- Nowak, M. A., Page, K. M., & Sigmund, K. (2000). Fairness versus reason in the ultimatum game. *Science*, 289(5485), 1773–1775.
- Platow, M. J., Eggins, R. A., Chattopadhyay, R., Brewer, G., Hardwick, L., Milsom, L., ... Welsh, J. (2013). Two experimental tests of relational models of procedural justice: Non-instrumental voice and authority group membership.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2(2), 361–376.
- Rankin, L. E., & Tyler, T. R. (2009). Justice and cooperation. *Netherlands Journal of Psychology*, 65(4), 146–154.
- Rasinski, K. A. (1987). What's fair is fair-Or is it? Value differences underlying public views about social justi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3(1), 201–211.
- Rothmund, T., Becker, J. C., & Jost, J. T. (2016).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justice in political thought and action. In C. Sabbagh & M. Schmitt (Eds.), *Handbook of social justice theory and research* (pp. 275–291). New York: Springer.
- Rousseau, D. M., Sitkin, S. B., Burt, R. S., & Camerer, C. (1998). Not so different after all: A cross-discipline view of trus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3(3), 393–404.
- Rudolph, T. J., & Evans, J. (2005). Political trust, ideology, and public support for government spend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9(3), 660–671.
- Sabbagh, C., & Schmitt, M. (2016).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social justice theory and research. In C. Sabbagh & M. Schmitt (Eds.), *Handbook of social justice theory and research* (pp. 1–11). New York: Springer.
- Sanfey, A. G., Rilling, J. K., Aronson, J. A., Nystrom, L. E., & Cohen, J. D. (2003). The neural basis of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in the ultimatum game. *Science*, 300(5626), 1755–1758.
- Scholz, J. T., & Lubell, M. (1998). Trust and taxpaying: Testing the heuristic approach to collective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2(2), 398–417.
- Schoorman, F. D., Mayer, R. C., & Davis, J. H. (2007).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trus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2(2), 344–354.
- Shockley, E., Neal, T. M. S., PytlikZillig, L. M., & Bornstein, B. H. (2016).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trust: Towards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ntegration*. New York: Springer.
- Song, L. F. (2016). Enhanci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ology discourse. *Sociological Studies*, (5), 10–26.
- [宋林飞. (2016). 增强社会学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 *社会学研究*, (5), 10–26.]
- Sullivan, B. A., Snyder, M., Sullivan, J. L., & Chapp, C. (2008). The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Cooperation: Synthesis and prospects. In B. A. Sullivan, M. Snyder, & J. L. Sullivan (Eds.), *Cooperation: The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effective human interaction* (pp. 343–358).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Sun, M. (2009). Market transition and people's percep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ociological Studies*, (3), 78–88.
- [孙明. (2009). 市场转型与民众的分配公平观. *社会学研究*, (3), 78–88.]
- Sunshine, J., & Tyler, T. R. (2003). The role of procedural justice and legitimacy in shaping public support for policing. *Law & Society Review*, 37(3), 513–548.
- Thibaut, J. W., & Walker, L. (1975). *Procedural justice: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Hillsdale, NJ: Erlbaum.
- Tyler, T. R. (2000). Social justice: Outcome and proced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35(2), 117–125.
- Tyler, T. R. (2008). The psychology of cooperation. In B. A. Sullivan, M. Snyder, & J. L. Sullivan (Eds.), *Cooperation: The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effective human interaction* (pp. 105–121).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Tyler, T. R. (2011a). Trust and legitimacy: Policing in the USA and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8(4), 254–266.
- Tyler, T. R. (2011b). *Why people cooperat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yler, T. R. (2012). Justice and effective cooperation.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5(4), 355–375.
- Tyler, T. R. (2016). Trus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E. Shockley, T. M. S. Neal, L. M. PytlikZillig, & B. H. Bornstein (Ed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trust: Towards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ntegration* (pp. 203–215). New York: Springer.
- Tyler, T. R. (2017). Procedural justice and policing: A rush to judgment?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 13, 2.1–2.25.
- van Damme, A., Pauwels, L., & Svensson, R. (2015). Why do Swedes cooperate with the police? A SEM analysis of Tyler's procedural justice model. *European Journal on Criminal Policy and Research*, 21(1), 15–33.
- van den Bos, K. (2005). Wha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fair process effect? In J. Greenberg & J. A. Colquitt (Eds.),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pp. 273–300).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van den Bos, K. (2015). Humans making sense of alarming conditions: Psychological insight into the fair process effect. In R. S. Cropanzano & M. L. Ambros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justice in the workplace* (pp. 403–41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an der Toorn, J., Tyler, T. R., & Jost, J. T. (2011). More than fair: Outcome dependence,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the perceived legitimacy of authority figur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7(1), 127–138.
- van Lange, P. A. M., Balliet, D., Parks, C. D., & van Vugt, M. (2014). *Social dilemmas: The psychology of human cooper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an Lange, P. A. M., De Bruin, E. M. N., Otten, W., & Joireman, J. A. (1997). Development of prosocial, individualistic, and competitive orientations: Theory and preliminary evid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4), 733–746.
- van Lange, P. A. M., Joireman, J., Parks, C. D., & van Dijk, E. (2013).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dilemmas: A review.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20(2), 125–141.
- Verboon, P., & Goslinga, S. (2009). The role of fairness in tax compliance. *Netherlands Journal of Psychology*, 65(4), 136–145.
- Vermunt, R., & Steensma, H. (2016). Procedural justice. In C. Sabbagh & M. Schmitt (Eds.), *Handbook of social justice theory and research* (pp. 219–236). New York: Springer.
- Wang, E. P., Zhang, S. W., Zhou, J., & Feng, J. P. (2014). Administrative errors and discontent: The case studies of Mass incidents in China. *Asia-Pacific Studies*, 1(1), 31–43.
- Wang, E. P., Zhou, J., & Zhang, S. W. (2015).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of discontent. In B. Xiao (Ed.), *Politics review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Vol. 8, pp. 5–15). Shanghai, China: Truth & Wisdom Press.
- [王二平, 周洁, 张书维. (2015). 社会不满的政治与社会意义. 见 肖滨(编), *中大政治学评论* (第8辑, pp. 5–15).

- 上海: 格致出版社.]
- Wang, P., & Chen, L. (2011). The effects of sanction and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on trust and cooperation in public goods dilemmas.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3(1), 52–64.
- [王沛, 陈莉. (2011). 惩罚和社会价值取向对公共物品两难中人际信任与合作行为的影响. *心理学报*, 43(1), 52–64.]
- Wang, Y., Wu, B., Li, S., & Zhou, Y. (2015). Neural basis of fairness. *Science & Technology Review*, 33(9), 83–92.
- [王赞, 吴斌, 李纾, 周媛. (2015). 公平的神经基础. *科技导报*, 33(9), 83–92.]
- Wang, Y., Wei, Z. H., Shen, S. C., Wu, B., Cai, X. H., Guo, H. F., ... Li, S. (2016). The response of Chinese scholars to the question of "How did cooperative behavior evolve?".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61(1), 20–33.
- [王赞, 魏子晗, 沈丝楚, 吴斌, 蔡晓红, 郭慧芳, ... 李纾. (2016). 世纪科学之问“合作行为是如何进化的”——中国学者的回应. *科学通报*, 61(1), 20–33.]
- Wang, Z. X. (2016). Citizens' institutional trust in East Asia: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stitution and culture. *Open Times*, (2), 119–137.
- [王正绪. (2016). 东亚公民对政治机构的信任: 制度与文化的差异. *开放时代*, (2), 119–137.]
- Wang, Z. X., & You, Y. (2016). The arrival of critical citizens: Decline of political trust and shifting public prioritie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1), 105–124.
- Watson, A. C., & Angell, B. (2013). The role of stigma and uncertainty in moderating the effect of procedural justice on cooperation and resistance in police encounters with persons with mental illnesses. *Psychology, Public Policy and Law*, 19(1), 30–39.
- Wegener, B. (2000).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A social justice approach: Introduction.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3(2), 75–82.
- Wen, Z. L., Liu, H. Y., & Hau, K. T. (2012). *Analyses of moderating and mediating effects*. Beijing, China: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 [温忠麟, 刘红云, 侯杰泰. (2012). *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分析*.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 Wen, Z. L., & Ye, B. J. (2014). Analyses of mediating e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methods and model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5), 731–745.
- [温忠麟, 叶宝娟. (2014).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22(5), 731–745.]
- Wu, X. N., & Wang, E. P. (2013). Outcome favorability as a boundary condition to voice effect on people's reactions to public policymaking.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3(2), 329–337.
- Wu, X. N. (2016). Procedural justice and trust in authority: A mechanism for acceptance of public policy.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8), 1147–1158.
- [吴玄娜. (2016). 程序公正与权威信任: 公共政策可接受性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24(8), 1147–1158.]
- Xu, M. Q. (2001). The classification of fairness and the proportions in different kinds of fairnes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 35–43.
- [徐梦秋. (2001). 公平的类别与公平中的比例. *中国社会科学*, (1), 35–43.]
- Xu, S. Y., Ren, B., & Lv, L. (2016). *A collection of papers on management theory development*. Beijing, China: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徐淑英, 任兵, 吕力. (2016). *管理理论构建论文集*.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Yamagishi, T., Horita, Y., Mifune, N., Hashimoto, H., Li, Y., Shinada, M., ... Simunovic, D. (2012). Rejection of unfair offers in the ultimatum game is no evidence of strong reciproci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9(50), 20364–20368.
- Yamagishi, T., Horita, Y., Takagishi, H., Shinada, M., Tanida, S., & Cook, K. S. (2009). The private rejection of unfair offers and emotional commitmen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6(28), 11520–11523.
- Yao, Q., & Ma, H. W. (2013). *The contemporary research on tru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sychology*. Beijing, China: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 [姚琦, 马华维. (2013).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当代信任研究*.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 Yi, C. F., & Jiang, F. Y. (2014). The coexistence between concealed rules and formal rules under the context of China: Analysis based on the cases of illegal demolition.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11(4), 18–28.
- [易成非, 姜福洋. (2014). 潜规则与明规则在中国场景下的共生——基于非法拆迁的经验研究. *公共管理学报*, 11(4), 18–28]
- Zhang, Q. (2010). *Effect of trust in administration on public attitudes and cooperative behaviors: Distributive and procedural justices as mediator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张婧. (2010). *当局信任对公众态度和合作行为的影响: 分配公正感和程序公正感的中介作用* (博士学位论文). 中国科学院.]
- Zhang, Q., & Wang, E. P. (2010). Local political trust: The antecedents and effects on earthquake victims' choice for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38(7), 929–939.
- Zhang, Q., & Wang, E. P. (2010). The effects of political trust on public attitudes and cooperative behaviors in social dilemma.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10), 1620–1627.
- [张婧, 王二平. (2010). 社会困境下政治信任对公众态度和合作行为的影响. *心理科学进展*, 18(10), 1620–1627.]
- Zhang, S., Dai, C. L., & Li M. P. (2010). Organizational justice: Review and prospect.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7), 1189–1192.
- [张松, 戴春林, 李茂平. (2010). 组织公正研究: 回顾与展望. *心理科学进展*, 18(7), 1189–1192.]
- Zhang, S. W. (2013a).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mass incidents: Empirical research on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intergroup threat*. Beijing, China: China Light Industry Press.
- [张书维. (2013a). *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机制——基于相对剥夺与群际威胁的实证研究*.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 Zhang, S. W. (2013b). Intergroup threat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tention: Dual-pathway model of mass incidents.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5(12), 1410–1430.
- [张书维. (2013b). 群际威胁与集群行为意向: 群体性事件的双路径模型. *心理学报*, 45(12), 1410–1430.]
- Zhang, S. W. (2015).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mass incidents. In B. Xiao (Ed.), *Politics review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Vol. 8, pp. 16–34). Shanghai, China: Truth & Wisdom Press.
- [张书维. (2015). 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机制. 见肖滨(编), *中大政治学评论* (第 8 辑, pp. 16–34). 上海: 格致出版社.]
- Zhang, S. W. (2016).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mproving paths of trust in government. *National Governance*, (34), 43–48.
- [张书维. (2016). 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研究. *国家治理*, (34), 43–48.]
- Zhang, S. W., & Jing, H. B. (2014). The institutional-cultural attribution of political trust and its effects on cooperation with government.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Philosophy &*

- Social Sciences*), 67(5), 77–84.
- [张书维, 景怀斌. (2014). 政治信任的制度-文化归因及政府合作效应.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7(5), 77–84.]
- Zhang, S. W., & Wang, E. P. (2011). The motiv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mass incident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12), 1730–1740.
- [张书维, 王二平. (2011). 群体性事件集群行为的动员与组织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19(12), 1730–1740.]
- Zhang, S. W., Wang, E. P., & Chen, Y. W. (2011). Relative deprivation based on occupation: An effective predictor of Chinese life satisfaction.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2), 148–158.
- Zhang, S. W., Wang, E. P., & Zhou, J. (2012). The motivation mechanism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different contexts.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4(4), 524–545.
- [张书维, 王二平, 周洁. (2012). 跨情境下集群行为的动因机制. *心理学报*, 44(4), 524–545.]
- Zhang, S. W., Xu, Z. G., & Xu, Y. (2014). Social justice and political trust: The mechanism of cooperation with government.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4), 588–595.
- [张书维, 许志国, 徐岩. (2014). 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 民众对政府的合作行为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22(4), 588–595.]
- Zhang, W., Zhang, Z., Gao, Y., Duan, H. P., & Wu, X. N. (2016). The theoretical models and brain mechanisms of interpersonal trust game during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11), 1780–1791.
- [张蔚, 张振, 高宇, 段华平, 吴兴南. (2016). 经济决策中人际信任博弈的理论模型与脑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24(11), 1780–1791.]
- Zhou, J., & Wang, E. P. (2012). Pathways to hostile collective action: The roles of general attitudes toward the advantaged group and situational anger. *PsyCh Journal*, 1(2), 90–100.

Social justice, institutional trust and public cooperation intention

ZHANG Shuwei

(Center for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School of Govern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Social justice is one of human's long pursuit, as well as core values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People's perception of social justice affects their institutional trust, which in turn influences their cooperation with government. However, for the lack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cooper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or institutional trust,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the process from social justice to public cooperation in individual-institution interaction. This research consisting of three studies focused on the mechanism under which social justice has an impact on cooperation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trust in public good dilemmas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aboratory experiment. Furthermore, ultimatum game and impunity game were creatively used in individual-institution interaction to successfully manipulate social justice. Social justice includes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procedural justice. In addition, institutional trust is divided into instrumental trust and motive-based trust. Pre-study investigated the ratio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ultimatum game, which was the base of study 1 and study 2. Study 1 aims to find the dual-pathway model from social justice to public cooperation through one pathway of instrumental trust and another pathway of motive-based trust in the organizational context. Moreover, the purpose of study 2 is extending this dual-pathway model to the social context.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First, people with high distributive justice were mo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cooperation than those with low distributive justice. Meanwhile, people with high procedural justice were also mo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cooperation than those with low procedural justice.

Second, both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procedural justice positively influenced public cooperation intention (PCI) at the same time. On the other hand, both instrumental trust and motive-based trust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justice and PCI. This fact supported the “dual-pathway model of PCI”. In general, the total effect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on PCI was stronger than that of procedural justice.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implication of this research is setup of the dual-pathway model to public cooperation intention with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s in the organizational and social contexts. In addition, the current series of studies provide some useful experimental paradigms (e.g., ultimatum game and impunity game) for manipulating social justice. Regarding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 mechanism underlying public cooperation in China to help managers and administrators understand how to improve individuals' cooperation with institution.

Key words distributive justice; procedural justice; instrumental trust; motive-based trust; ultimatum game; impunity game; public good dilemmas